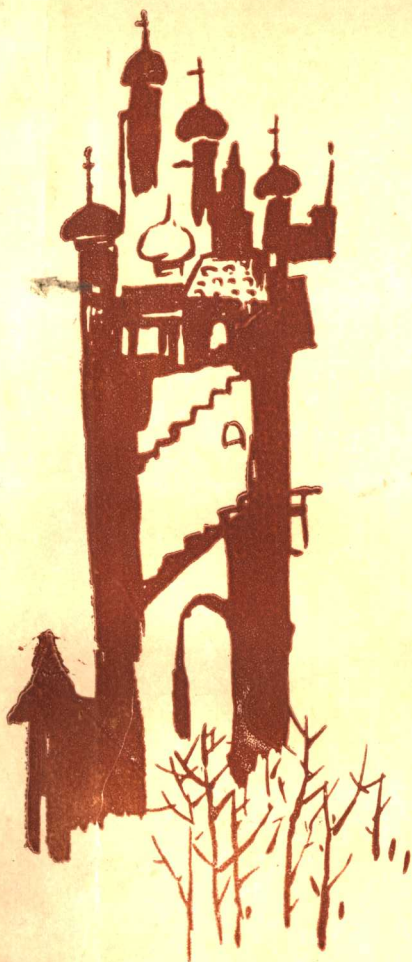


教会大学

在近现代中国

谭双泉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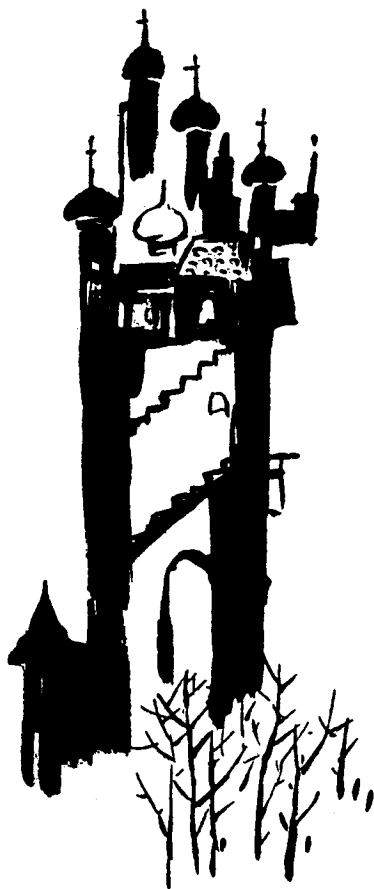


SBP236/10

教会大学

在近现代中国

谭双泉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教会大学在近现代中国

谭双泉 著

责任编辑:袁乐和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东风路附1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政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印张:7.75 字数:170000

1995年8月第1版 1995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7-5355-2241-6/G·2236

定价:6.8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教会大学的缘起	(11)
第一节 在炮舰呼啸中传播福音	(11)
一、利玛窦来华与清廷禁教	(11)
二、用炮舰轰开中国的大门	(18)
第二节 武力征服不能代替文化认同	(25)
一、对华传教事业举步维艰	(25)
二、两种文化的深刻分歧	(31)
第三节 传教重心转向办大学	(38)
一、对教会教育认识的统一	(38)
二、重心在办教会大学	(41)
第二章 教会大学的概貌	(47)
第一节 教会大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47)
第二节 教会大学的办学方针、组织机构、经济状况 和治校方法	(56)
一、办学方针	(56)
二、组织机构	(58)
三、经济状况	(64)
四、治校方法	(70)
第三节 对几所教会大学的个案考察	(73)
一、燕京大学	(73)
二、岭南大学	(79)

三、湘雅医学院·····	(83)
第三章 大革命时期的教会大学 ·····	(90)
第一节 1922 年的非基督教运动·····	(90)
第二节 1924 年的收回教育权的斗争·····	(97)
一、收回教育权斗争的爆发·····	(97)
二、全国各地收回教育权的斗争·····	(101)
第三节 五卅、北伐与教会大学·····	(105)
一、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中的教会大学·····	(105)
二、五卅、北伐对教会大学的影响·····	(109)
第四章 十年内战时期的教会大学 ·····	(113)
第一节 在中国民族觉醒面前的新措施·····	(113)
一、天主教的“中国化”·····	(113)
二、基督教的“本色运动”·····	(116)
第二节 农村实验区工作计划流产·····	(117)
一、“实验区”计划的实质·····	(117)
二、“实验区”计划的破产·····	(121)
第三节 教会大学与“一二·九”运动·····	(124)
一、燕京大学在“一二·九”运动中·····	(124)
二、全国各地教会大学的响应·····	(129)
第五章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教会大学 ·····	(131)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教会大学·····	(131)
一、在战火中内迁·····	(131)
二、专业和课程设置的调整·····	(134)
第二节 战后从呼吁和平、民主到迎接全国解放·····	(139)
一、卷入风起云涌的和平民主运动·····	(139)
二、迎接全国解放·····	(144)
第三节 大陆教会大学的消亡·····	(147)

一、最后的阴谋策划·····	(147)
二、教会大学的消亡·····	(149)
第六章 教会大学与中西文化交流 ·····	(153)
第一节 正确认识教会大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 历史作用 ·····	(153)
第二节 西学东渐的一个载体 ·····	(158)
一、西方科学技术的东渐及对中国科技近代化的某些 促进作用 ·····	(158)
二、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传入及其影响 ·····	(164)
第三节 教会大学与东学西渐 ·····	(169)
第七章 教会大学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	(174)
第一节 教会大学世俗化、正规化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	(174)
第二节 对中国传统教育改革的导向作用 ·····	(180)
一、洋务运动时期·····	(180)
二、戊戌维新时期·····	(184)
三、清末和辛亥革命时期·····	(187)
第三节 对中国新式教育发展的深刻影响 ·····	(190)
一、在理、工、农、林、医、体专业设置方面的先驱作用 ·····	(190)
二、开我国女子教育、残疾人教育等社会教育的先河 ·····	(194)
第八章 教会大学与中国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的成长 ···	(197)
第一节 教会大学有利于人才成长的若干特点 ·····	(197)
一、办学宗旨的二重性·····	(197)
二、有利于人才成长的若干特点·····	(200)
第二节 中国大批新式知识分子的涌现 ·····	(207)

一、一批批民族觉醒的先导者.....	(207)
二、大量蜚声中外的专家、学者	(212)
三、两个典型人物的个案考察.....	(216)
附录 1: 21 所教会大学始末简介.....	(225)
附录 2: 本书主要参考资料	(242)
后记	(244)

前 言

(一)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他们的对华侵略开始具有新的历史特点。尤其是《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列强在经济上对华以资本输出为主代替商品输出为主,在军事政治上则展开了划分势力范围的角逐。为适应这种经济政治侵略的需要,就加紧了对华的“精神输出”。他们利用天主教、基督教机构等在中国创办学校,弘扬西方“文明”,奴化中国人民的意识,培养洋奴买办,借以建立和巩固在中国的殖民主义统治秩序。

在对华实行和平渗透的“精神输出”过程中,19 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居领先地位。从 1830 年到 1848 年,各国新教派到中国的传教士共 98 人,其中美国有 73 人,占西方各国新教传教士总人数 1/3 以上。^① 这时美国对华贸易远逊于英国,而传教事业仅 10 余年即跃居首位,对华“精神输出”远远超过对华商品输出,这也是早期美国对华关系的一个特点。到 19 世纪 80 年代,美国国内正掀起一股向海外宣教的狂潮。从 1868 年到 1918 年,美国派往海外的传教士达 8000 多人,其中有 2500 多人来到中国,约占总数的 1/3。^② 这个时期,美国在华传教士不仅数量上遥遥

①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台北,1978 年版,第 65 页。

②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 258 页。

领先西方诸国,而且越来越重视把教会工作大规模地转向办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方面。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中国办教会大学的主要目的,他们并不讳言,概括起来有如下述:

第一,鉴于传统的福音传播方式不合中国国情,传教士的父道主义(Missionary Paternalism)更易激起中国人的反感。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士大夫对西方态度开始有所转变,采用办学的方式布道,可以培养一种“持有基督教人生哲学”的特殊人才,以参与“指导”中华文化和国家生活的发展方向。传教士们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目的——尤其是基督教大学的目的,是要培养一种特殊的人才。此种人才,不独要有专门学识和训练,对于改造国家的影响,可因少数坚决的领袖而转移,影响到该地人民以后的历史。”“倘若基督教学校能产生出持有基督教人生哲学和富于道德裁判力的领袖人才,倘若他们能参与指导中华文化和国家生活进步的方向,而且能有实力令这种进步得以实现,这便是基督教育永久特殊的贡献。”^①

第二,西方列强在中国办教会大学,用以掩盖其政治侵略目的,以培植一批能控制中国发展的“精神领袖”。1908年《日本外交时报》刊载的《论各国以国际竞争争夺中国教育权》一文中说:“美之奖励中国青年,意亦甚殷,派遣学者赴华,传授教育,其精神活泼,能使人知其宗旨为情爱主义之宗教,而不知其为政治之竞争。”^②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时,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给总统的《备忘录》中说:“那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那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上和商业

①② 李楚材辑:《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3、7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版。

的影响上取得最大的收获。”如果及早地注意了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就一定能够通过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们，来对中国的发展进行一种最令人满意的又最为巧妙的控制。”^①

第三，西方列强通过办教会大学，对华进行思想文化渗透，为逐步地“革新”中国文化，使中国民族走上“西化”、“基督教化”奠定社会基础。《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一书中赞扬道：“教会学校实尝养成多数之男女人士，……今皆身膺重要之位置，于政治、教育、商业及基督教会今方发展之情况，咸大有作为。”在《新教育》五卷一、二期上刊登的一篇《基督教教育之宗旨与精神》中又说：“必有彻底纯洁的基督教，方足使中国彻底的受基督教化。……至教区之增加扩充，非基督教之终鹄，不过为达到大目的之一手段。大目的盖在造成中国为一基督教民族。”^②

第四，西方列强通过教会教育，“巧妙的控制”中国的发展，其中也包括着泯灭正在日益兴起的中国革命的企图。1938年4月《基督教教育季刊》所载《基督教教育目的》一文中说：“现在的世界上，正有左右两种的革命。偏于右的是法西斯，这是属于上层阶级的革命；偏于左的是共产主义，是下层阶级的革命。……我们现在需要中间的革命。……我们先要改变我们的心，以后方能改变个人，改变社会的秩序。”^③直至1948年全国解放的前夕，天主教召开公教教育会议，于斌主教在会上还杀气腾腾地说：“今天，我们一面要戡乱，一面还要努力于建设，天主教该领导整个社会，建设真、美、善、圣的新中国。”^④教会教育这个泯灭革命，建设一个“新中国”的企图不是昭然若揭吗？！

总起来讲，西方列强在中国办教会大学的特殊目的和作用，

①② 李楚材辑：《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3、7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版。

③④ 同上书，第4—5页。

决不止于办教育本身，而是有其更深远的政治企图，归根结蒂，是为了争夺中国人心、改变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如1915年一位美国驻华使节盛赞美国在中国教育上的成就时说：“凡初至中国之人，有一事足以深印于其脑海中者，即美人对于中国教育之热心毅力，冀以形上形下之道，唤醒此最大多数之支那民族也。”接着，他指出在中国进行“智力投资”有一本万利的效益。“夫美人之在中国，以振兴教育为己任，以狭义言，固深有裨于中国前途，特以广义言之，则美人之所得，亦正无涯量，盖助人即以助己，此固一定之理也。”^①直至全国大陆解放前夕，协和医学院美国校长顾林写信给国民党政府卫生部美国顾问兰安生的信中还说：“用一百万美元来支持各教会大学，比用二百万美元帮助蒋介石维持军队更有用。军队会叛变，至于由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则更为驯服可靠，忠诚不变。”^②可见西方列强对我国进行文化教育侵略，其罪恶目的是供认不讳的。

正是在上述思想指导下，西方在中国发展教会教育达到了相当可观的规模。尤其是美国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多数列强都已参战的机会，加速了在华教会教育的发展。这时教会学校净增数，美国所占比例在70%以上。特别是先后创办了一大批教会大学，如上海的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武昌的华中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大，福州的华南女大、协和大学，广州的岭南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燕京女大、协和医科大学，这16所院校，后来经过改组，成立“中国基督教教会大学协会”（1919年）。当时中国的国立大学只有3所（北京大学、

① 《美国在中国教育上之势力》，载《中华教育界》第四卷，第三期。

② 见1952年7月《新华月报》第162页。

山西大学、北洋大学),新建的私立大学也为数不多。这样,美国教会大学不仅囊括了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大学十之八九,而且比中国自己办的大学还要多,就是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最初也多是聘请美国人主其事。像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所说:差不多中国全部大学都是由美国人创办与美国主持。^①而这些由美国人创办的大学都向美国注册,其毕业生可以不经考试而直接升入美国的州立大学或其他有关的大学、研究院,并可获得相应的学位。

帝国主义者为了更好地实现文化教育上的侵略目的,他们在旧中国建立了一系列教育组织和机构,比如广学会(1887年,上海)、中华基督教协会(前身是“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中华教育会”,1877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1876年,上海)、在华基督教大学纽约托事部(1915年,北京)、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1924年,北京)等等。这些组织和机构对教会学校起着联络、领导或支撑的作用。

教会学校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得到了封建主义的大力支持。如:1906年,清政府学部咨告各省督抚:“外人在内地开设之学校,均无庸立案。”1917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公告说:“只要教会学校请求考核承认,政府以宽大为怀,不分中外,一视同仁,准予依照私立学校的手续办理。”^②蒋介石政权同样执行如此媚外、惧外的政策。尽管1926年国民政府制定了《私立学校规程》,1927年公布了《私立中等学校及小学立案条例》、《私立大学校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等,按这些规定,私立学校包括教会学校的校长应由中国人担任,校董会的中国董事名额须占多数等等,

①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台北,1978年版,第620页。

② 参考《中国教育年鉴》第一辑。

但在实行中有的照办了,有的则阳奉阴违,有的学校则受外国教会之命,以暂行停办相威胁,致使教会学校的实权仍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为差会所控制。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教育侵略,中国人民一直没有停止过斗争。早期曾发生百余次教案,遍及全国十八省。1909年在中华教育会第六届年会上就出现过中国籍教师争取平等地位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李大钊、陈独秀和蔡元培等发起组织“非宗教同盟”,继而发展为“收回教育权运动”。1923年有邓中夏、恽代英参加的“少年中国学会”的“苏州会议”,通过纲领,反对“丧失民族性的教会教育及近于侵略的文化政策”。中国人民首先是广大知识青年(包括教会学校的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斗争,西方殖民主义者总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对中国教会学校的发展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调整。他们调整的目的不是取消教会学校的宗教目标 and 政治意图,而是要使之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使“教会学校教育必须更加有效率,更加基督教化,更加中国化”。即把基督教这根西方文明的精神支柱更好地移植到中国来,根据中国国情的变化渗透到社会结构的各个领域中去,借以巩固殖民主义的统治。

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发展教会高等教育,其目的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实现,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近现代教会大学的历史也只得宣告结束。然而这种教会教育制度的消亡,决不意味着帝国主义者对华进行文化侵略和思想渗透的危险已不复存在,相反地,面对着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崛起,它们只是改变了“精神输出”的方式而已。这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

(二)

教会大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是极其复杂而曲

折的。影响这过程的除政治因素以外,还有其他如文化、社会、教育等诸方面的因素。如果说我们上面讲的只是着重从政治视角来研讨教会大学在近现代中国的问题,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也反映了它的基本方面,但是,在当今条件下就显得不够了。

今天的世界正在变小。由于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支配地位,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科学技术国际化的大趋势日益明显。“一国两制”的政治构想意味着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把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形态乃至宗教信仰都涵摄在一个“多样化的统一体之中”。而今天“一体化”世界的形成,又是人类几千年不同政治、经济、文化冲撞与融汇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应当从“全球一体化”的观点出发,以更客观的、冷静的态度,在广阔的视野里,用多维的方法,来研究教会大学在中国近现代的发展过程,这样就有可能发现以往不曾发现甚至被忽视了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因而能够突破现存的研究格局,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争取有较为新的、可以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特点的研究成果。在这本小册子里,我们试图朝这个方向作些努力。

在研究工作中,我们注意了如下几点:

(一)着眼于中国近代化。西方在中国办教会大学,有鲜明的宗教色彩,是企图以基督精神统治中国,并为列强的殖民主义政策服务;但由于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排拒(尤其是对异质精神、价值观的抵制),以及激烈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的发展,以至酿成 1922 年的非基督教运动和 1924 年开始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到本世纪 30 年代后期,教会大学重新建立其办学目标,逐步地转向了已为中国近代化服务。如在大学中增设了农科、工科及医学等科目,也开设了不少研究及实验中心,引进现代科技。教会大学有的也向学生灌输为社会、国家服务的精神,培养有责任的公民理想,以及鼓励学生参与农村建设和反日爱国运动等等。

这些在客观上似乎适应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二)动机与效果。恩格斯曾说：“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①教会大学在中国近现代的发展，大体也是如是。西方教会是要通过办教育培养新式知识分子以取代旧式士大夫，进而控制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但是，事实上，中国历史的进程并没有完全按照西方的意愿演进。传教士变成教育家这一角色嬗变，不仅向中国引进了某些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而且教会大学的大多数师生都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热爱祖国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浪潮波及全国，几乎各个教会大学都先后建立党的组织，广大师生在党的指引下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与全国人民共同谱写了民主革命斗争的壮丽史诗，这是与西方教会的初衷背道而驰的。

(三)慎重区别各种关系。西方在华兴办教会大学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不仔细地分析，往往容易不加区别地把他们都看作侵略行为。在这些来华传教士中，确有披着传教士外衣而敌视中国人民的侵略分子；也有从事教会教育而不完全赞成他们国家侵华政策的；有的虽不完全赞同他们国家的侵华政策，但有白种人的优越感；也有同情中国人民并对中国表示友好的；其中除多数来自美、英、法、德等国之外，也有来自丹麦、挪威、瑞典等国家的。我们不仅要对决策者和一般人加以区别，就是在一般从事教育工作的传教士中也应根据不同情况加以区别。尤其要区别帝国主义殖民政治与基督教的界限，区别基督教中传教与办教会大学的界限，区别教会大学中宗教教育与世俗教育的界限。这样才能比较实事求是地揭示出教会大学在近现代中国发展的基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4页。

特征和历史规律。

(四)作用的两重性。教会大学从它开办时起就有宗教课和文化科学课,它既传播基督福音又传播文化科学知识。随着历史的进展,宗教课和文化科学课的比重有所改变,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教会大学先后取消强迫学生参加宗教活动的规定,宗教课改为选修课。大学的专业从神学科、文理科、医科逐渐增设教育科、农科、法科、社会学科等,教育的内容从宗教扩大到世俗。我们既要看到教会大学在宗教方面的影响,又要看到它在文化科学方面的作用。就文化科学知识来说,它既可以用来为西方列强在华侵略活动服务,又可以用来为改造中国、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服务。这不同的社会效应不仅取决于办教育者,而且还取决于受教育者。就教会大学的办教育者而言,他们把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是严重的挑战,引起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者;他们把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也扩大了中国人的眼界,有助于人们的思想解放,在这点上它又是外来新文化的传播者。

总之,西方教会大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固然有深刻的政治背景,但又不能单纯从政治的视野还必须从文化学等角度来考察,才能使我们获得一种较为全面和接近事物本来面目的认识,从而既看到传教士和教会大学曾充当过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先遣队和桥头堡,又看到它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某种积极的作用,以及它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占有的相当重要的位置 and 对中国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的成长有过一定的历史业绩,等等。要知道,这种文化交流当时是在极不平等、不公正的历史氛围中进行的,帝国主义的炮舰和不平等条约充当了外来的西方文化渗透的前锋和后盾,就中国本身来说则是处于一种被欺侮、被凌辱的局面中承受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同志曾说:“过去

中国闭关锁国一个半世纪，落后了，吃了大亏。”^①又说：“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②今天，我们的情况和过去根本不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总结过去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我们吸收、引进西方的思想文化和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再不受任何外来势力的强制，不是被迫地，而是主动地、自觉地这样去做了。我们可以从容地、多方面地研究和总结这类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推动包括西方宗教文化在内的中西文化交流。教会大学是基督教理性化和世俗化进程中的产物。它不仅是基督教文化中的一个方面，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对教会大学在中国发展历史的研究和总结，也许有助于更好地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使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